



泉州家族文化

苏黎明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泉州家族文化

苏黎明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家族文化 苏黎明著——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0.1

ISBN7—80128—223—X

I，泉... II，苏... III，家族文化 IV，G22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942 号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电话:63099063 66126185

网址: <http://www.zgys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厦门水产学院印刷厂印刷

(地址:集美嘉庚路10号 邮编: 361021)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8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K. 16 定价: 22 元

序

中国社会历史源远流长，变化纷繁复杂，但在上下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家族组织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家族文化始终是传统文化的固有部分，并渗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衍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因而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内源性”动力。如今家族组织已无法成为社会变迁的主体部分，但是家族思想或家族情结，仍然不时体现出巨大的凝聚力，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乡民修谱建祠，海外宗亲归故祭祖，更是屡见不鲜。

正因为此，家族可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称中国为“家庭结构式的社会”，以表示其独特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层意义上讲，认识家族文化，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认识家庭的变迁，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一直关注家族的原因所在，自近代以来，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对于家族的基本结构、组织功能有了一定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对于家庭组织的内在结构、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有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看法。这些研究的目的都非常清楚：试图获得解读中国社会文化的钥匙。我认为家族文化应是指研究家族的生活状况、行为方式、礼仪习俗、等级观念、宗族在生活中的作用。

泉州是文化古城，家族文化在此有悠久的历史，可谓根深蒂固，同时泉州又是中华家族文化播迁海外的源头之一，可谓枝繁叶茂。以泉州为地域范围进行家族文化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苏黎明同志是一位勤奋朴实的学者，身处泉州，很早就意识到研究泉州家族的学术价值，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泉州家族文化丰富的内容，多变的外观，多元的弹性结构，跨时代的社会功能，

不仅可以借此认识和理解泉州社会的过去与现状及未来发展，而且可以认识泉州与台湾同胞及东南亚侨胞的关系。”近十年来，他利用便利的地方优势，潜心治学，细心积累，查阅、搜集各种私家谱谍，进而撰写著作，《泉州家族文化》从计划到成稿，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如今得以付梓问世，无疑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实值欣慰。

苏黎明同志的这本书，颇有特色，具体而言：其一，作者对家族这一实体性组织进行了全面、周详的、结构的剖析，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展现了泉州家族在亲属、财产、礼仪、教育、迁移等方面的内容，使读者对泉州家族状况一目了然。其二，作者在收集史料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家谱作为私家史料，借阅难度很大，从引文情况看，作者至少阅读了近百部的家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全书的史料丰富翔实，基本上是第一手的、获自民间的资料，不仅如此，这些材料的首次披露，并有初步的排比分类，也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其三，该书的中心是泉州的家族文化，地域特征是其重要内容，因此在分析泉州家族形态时，作者尽量将家族某些形态的产生与泉州地方历史文化相联系，从中反映了泉州家族文化特点，尤其族产的积累、播迁海外等部分论述得相当充分。

《泉州家族文化》作为苏黎明同志的学术研究，就其完整性、学术性而言，是成功的。但是“家族”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的领域还很多，这也是学术界长期讨论该问题，不断有新成果出现的根源。可以预见，只要潜心研究，继续积累，扩大视野，期待苏黎明同志将撰写出有关“家族”研究的系列学术著作。

孔 永 松

2000年6月28日谨识于松石斋

目 录

第一章	中州人徙泉·····	(1)
第二章	家族制发展·····	(20)
第三章	族居与宗姓·····	(40)
第四章	房族与辈份·····	(61)
第五章	家庭与亲属·····	(80)
第六章	祠堂与族谱·····	(102)
第七章	族田与族产·····	(127)
第八章	族权与族政·····	(146)
第九章	祭祖与族化·····	(168)
第十章	族学与教化·····	(188)
第十一章	播迁台湾岛·····	(208)
第十二章	薪传东南亚·····	(231)

第一章 中州人徙泉

泉州社会历史源远流长,上下越千年,家族文化始终是泉州传统文化的固有成分。泉州是福建乃至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家族文化成为泉州基层社会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是泉州传统社会生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弥散于泉州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家教、习俗等等,并随着大批泉州人向外移居而播迁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泉州家族文化丰富的内容,多变的外观,多元的弹性结构,跨时代的社会功能,不仅可以借此认识和理解泉州社会的过去与现状及未来发展,而且可以认识泉州与台湾同胞及东南亚侨胞的关系。

家族文化指的是家族关系以及由此发生的种种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它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生活形式。泉州家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泉州地区的开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泉州地区的开发,则与历史上中原和北方士民大量南迁紧密相关,因此可以说,多彩多姿的泉州家族文化,是由不断南迁泉州的中原士民逐步孕育出来的。漫步泉州,无论在宁静的乡村或繁华的市镇,无论是绮丽堂皇的民居楼房抑或庄严肃穆的家族祠堂,门前上方的匾额上,随处可见镶嵌着这些醒目的大字:“太原衍派”、“清河衍派”、“陇西衍派”、“颍水传芳”、“南阳传芳”、“上谷传芳”、“天水堂”等等。这些作为姓氏郡望或堂号标志的字眼,一方面折射出泉州家族文化的独特风情,让人直接感受到泉州居民慎终追远的情怀,领略到泉州家族文化的浓郁韵味;另一方面也透视出泉州居民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关系。

翻阅泉州民间族谱,大多数家族在追溯自己祖先的源流时,都清楚地载明自己的根在中原或北方,祖先来自中原或北方,本家族乃是中原或北方地区某一望族某一分子徙居泉州的后裔。尽管这些记载未必完全翔实,但今天泉州人的祖先大多来自中原和北方地区,却并非是历史的虚构。

泉州原是闽越族人的聚居之地。中原汉民入泉之前,闽族和越族是泉州的土著居民。新石器时代,闽族已在泉州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农业和渔业等方面的生产。南安丰州镇的狮子山和葵山上,曾发现有他们生产的工具和生活的屋基。他们俯瞰古南安江,渔猎为生。当时,狮子山下的丰州平原地处古南安江口,随着江河的淤积及海岸线的变迁,丰州平原逐渐向东海延伸,形成今天的泉州平原。《泉州府志》载:“泉州府,《禹贡》扬州之域,在周为七闽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汉郑玄注《国语·郑语》时说:“闽,蛮之别种也”。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闽”一词时说,闽是“东南越,蛇种”。也就是说,包括泉州在内的七闽是拜蛇为祖先的,是蛇图腾的氏族社会。南安诗山现尚有蛇王庙在。战国时期越族入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周显王卅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七世孙与楚威王作战,战败被杀,国亡于楚,“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越王族航海入闽,并与闽族土著发生融合,形成闽越族。越族入闽后,泉州与中原尚没有建立有效的行政关系。

秦代,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设置了闽中郡,泉州亦为闽中郡地。尽管这个时候泉州基本上仍由闽越土著统治,中央政府并没有派守尉令长来,只是名义上的行政统治,然而,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王朝派大将王翦统大军平定江南及北越。二十九年(公元前226年),越叛,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大军进平岭南。三年后,又有任嚣赵佗击越,谪戍50万守之。秦王朝为巩固南越地盘,还派军徙

吏随带家眷奴婢迁往岭南。《史记·淮南子衡山列传》云：“尉佗使人上书求无夫家者三万为士卒补衣”。《汉书·高帝纪下》也记载秦曾移中原之民于南方：“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越）杂处，……南海尉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秦徙中原汉人于百越，既巩固了汉文化，又起了同化百越居民的作用。《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云，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刘邦与项羽随即逐鹿中原，天下大乱，在南越的主帅任嚣赵佗恐祸及自己，遂兴兵绝道，使南方与中原于此无陆路可通，秦兵随即作鸟兽散，却已难以返回中土，相当部分秦兵只好就地安居，而一些秦兵及黔首则逃逸，辗转进入福建漳州、泉州一带。

据乾隆版《泉州府志·方外篇》载：“大道，不知何许人也。尝出游，逢人哭，问之，曰：‘长城之役，独子无兄弟，因出身代之’。尸解而归。修真清源左峰，后人供奉之，名大道岩”。现在清源山“峭壁游”岩下，仰望可见崖壁间隐约有“……开青壁”三巨字崖刻，据释全文为“大道开青壁”，此即当年大道修真之后，后人凿此以纪念之。因年代久湮，上截岩石崩塌，故只见“开青壁”三巨字而已。这是秦时中原人入闽来泉之一实证。秦始皇征徭役30万以筑长城，又兼苛政猛于虎，避秦而南来泉者当不只大道一人。

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勾践之后无诸，率闽越军队由闽中北上，跋山涉水，深入中原，从诸侯灭秦，又佐汉灭楚，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立为闽越王，统治闽中故地。泉州为闽越国地。无诸所率的闽越军队参加反秦运动及楚汉战争，和中原人民并肩作战达8年之久，在思想意识方面，受到汉族文化的濡染。

无诸死后，其子孙屡有攻杀。公元前110年，统治闽越的余善反汉，汉武帝派朱买臣兵出四路入闽，灭了闽越，并采用秦代迁徙六国豪强的策略，把闽越官僚贵族及大批闽越人迁移于江淮一带居住。《泉州府志·建置沿革》云：“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闽越乱，元封元年灭之，徙民于江淮，虚其地”。又注曰：东越狭多

阻，闽越人悍，数反复，故皆将其民徙处。随后，汉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加强对闽中地区的统治。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故地重设建制，称冶县。“泉州为冶县地”。冶县建立之初，户口不及1万，大部分集中于闽东和闽北山区，成分主要还是闽越遗民。

闽越土著大量被迁徙，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不仅是对泉州土著文明的严重破坏，而且也为中原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分散于闽中郡各地的先秦遗民，纷纷寻找安靖之处，相聚到此时已人烟稀少且又适宜繁衍生息的泉州一带。

汉武帝徙闽越民于江淮一事，为汉民入泉提供了空间，而汉武帝派兵入闽平闽越人叛乱，这本身又是汉代一次较集中的中原人移民来闽入泉的活动。许书纪先生所撰的《许姓开闽综合性概述》云：“据谱牒记载，许姓入闽时间甚早，上追两汉，最早为西汉汉武帝左翊将军许滢字元亮，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奉命来闽定叛乱，镇守泉州西南百里外之同安境上，世传此地称营城（滢与营同音），他在该地驻节七年半，平息叛乱，立了大功，深受汉武帝嘉许，敕旨永镇该地，以固东南边陲，铜符虎节，兵卫森严，一如小国之君。从此定居于其城之胡壶山。许滢有子十五人，分镇福建各地。闽越为蛮荒之地，土著反复无常，时生叛乱，许滢施以教泽，归化中地风尚。民谚未有同安，先有许督。明代南安钱塘乡许氏宗祠有一对联：‘开闽者三，西汉唐初五季。’由此可见许氏开闽时间之早与影响之深。许滢卒于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墓葬同安从顺里五虎山之西，墓表题曰：‘故汉上柱国左翊将军许公墓’。子孙世代守护”。汉兵定居闽越地之后，又成为中原移民。同安紧靠泉州，汉时隶属泉州。汉兵驻扎同安，泉州不可能没有汉兵入驻。

泉州在秦汉时代及其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成为中原士民的徙居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首先，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从

西汉设冶县到东汉末年，历时300多年，泉州长期安靖，与外界少有战事纷争，没有遭遇过中原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巾之乱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及三国纷争的破坏。福建偶有战事都集中在闽北和闽东，直至东吴入闽，战火也只祸及闽江周围。其次，从地理环境看，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依山傍水，北有戴云山名山横贯东西，为北面屏障，南面为浩瀚的大海，东为莆仙平原，西则丘陵起伏。中有晋江流域，造成近400平方公里的泉州平原，为劳动生息的理想地盘。泉州既便于农耕，也便于渔猎。泉州位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如春，湿润多雨，终年不冻，古称“温陵”。稻麦一年三季，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于北方。最后，闽越土著势力不断被削弱。中央政府大规模的迁徙政策，加上通过设置行政机构强化控制，使泉州一带的闽越土著遭到沉重打击，在这期间已大为失势，数量大大减少，已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对南来的中州士民构不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不仅使秦汉时已入居泉州的汉人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而且也继续吸引着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汉人不断地进入泉州。

据《惠安紫云黄氏宗史资料》云：“宋咸平元年(998年)榜眼黄宗旦写道：汉道隆公，光州固始人也，为东郡会稽市令，东汉建安之乱，弃官避地入闽，初居仙游，后改迁桐城之西关”。《惠安县志》也记载：“锦田黄姓，泉之世家著姓。始祖隆公，为东汉会稽令。东汉末乱甚，于建安(196—220年)，弃职避世入闽”。同书《寓贤传》又云：“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入闽，居邑南之凤山”。这说明锦田黄氏早在东汉末就已经入泉了。东汉末年，泉州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东吴即建安县于泉州西门外的丰州，属建安郡，辖地约今南安、晋江、同安三县。这是由于中原汉人入居泉州，泉州地区人口增加，所以在丰州置县加强管理。中原人不断南迁泉州的过程，也是泉州土著文明逐渐衰亡，中原文明在泉州逐渐扩展的过程。在泉州土著被消灭，

被迁徙和流窜山间的同时，由中原地区不断迁徙定居于泉州的外来居民，自然而然地成为泉州的新主人。

中原汉人大规模移居泉州是从西晋开始的，在西晋永嘉年间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泉州的考古发现和地方史志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1984年元月，南安丰州镇旭山庙下村挖掘地基时，挖出了“太康五年八月 日作”的墓砖、陶灶、陶碗、陶罐、陶器盖、陶釜等一大批文物。墓室为单室、券顶、砖构。太康五年（284年）是西晋司马炎年号。从墓的结构及随葬品看，墓主人应系由中原迁入的士大夫阶层，这也说明西晋时入居泉州的中原汉人已不少。

中原汉人移居泉州时，把中原的文化带到泉州。据《南安县志》记载：“延福寺，在县西九日山下，晋太康时建，去山二里许”。《泉州府志》云：九日山“自晋以来，缙绅先生以及方外之侣多登憩焉”。该书又云，“元妙观在府治南，晋太康中为白云观”。延福寺在南安丰州旭山附近，濒临晋江，肇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元妙观在现今泉州城南的晋江岸边，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这两座规制宏敞、独步泉南的大型宗教建筑物，一座是佛教大禅林，一座是道教大宫观，均凝聚着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和精深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当年文化艺术的结晶，且须耗费巨额资金方能建成。倘若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 and 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是不能几乎同时兴建这两座佛、道两教的巨大禅林宫观的。这表明，西晋时候已有不少中原汉人在泉定居，开发晋江两岸，此时晋江下游沿岸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汉人社会，并具有较为发达的经济。中原汉人入泉开拓，带来了中原文化，带来了他们所信仰的佛教和道教。

西晋末年，泉州仍较为安定，而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却爆发了诸王混战，中原一部分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为逃避战祸，纷纷南迁福建，进入泉州。南安丰州狮子山曾发掘一处规模颇大的两晋南朝墓地，计有墓17座，其中西晋墓1座，东晋墓4座，南朝墓12座。有明确纪年的有6座：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墓，东晋咸康元年（335

年)墓,宁康三年(375年)墓,太元三年(378年)墓,义熙十二年(416年)墓,刘宋元嘉四年(427年)墓。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永春城关牛头寨也发现东晋纪年的砖室墓。史书对此也有不少记载。《泉州府志》云:“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唐十道志》云:“清源郡,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葬其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亦云,晋江“在县南一里,以晋之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泉州民间的一些族谱,也记载着其家族祖先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中原南渡入泉州的。南安梅溪《陈氏族谱》云:“陈氏之先,颖川人也。……远祖梅洋三郎,当时困于兵乱,人不自保,惟恨所居之不远,遂入(闽中)深山穷谷,以为营生安业之地,若武陵桃源之避秦者”。晋江《儒林张氏联宗谱》云,东晋末年,有“郎中令曰韦,宗迁入闽,居晋江之古陵”。唐欧阳詹为晋江县郑季实撰写墓志铭时云:“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荜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①泉州《杨氏族谱》称,“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祖某漳州长史,父某泉州南安县丞。”南安《梁氏族谱》称,其祖先于“晋室乱离,梁芳以族随晋渡江,大衍于钱塘、合浦间,孙遐仕安帝,恒玄篡,逃闽。……因家南安。”以上说明,从西晋末年到东晋,又有大批中原土民徙居泉州。

这些入泉移民逐渐占据了整个泉州地区,并且同化融合了这一带的闽越遗民,繁衍生息而形成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人社会,从而完全改变了原来比较落后原始的闽越社会风貌。两晋时期,正是中原士族崇尚门阀的时代。徙居泉州的中原士民,不仅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对泉州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带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感。他们往往以世胄自居,看不起当地土著,血缘家族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① 《丰州集稿》卷14。

梁至唐代，汉人继续入泉。梁太清元年（547 年）之后的侯景之乱，三吴沦为战场，长江中下游一带兵祸连结，建康、江陵、广陵等繁华的城市都变成荒凉之地。《南史·侯景传》云：“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因此，这个时期，大批难民从长江中下游辗转入闽。《陈书·世祖本纪》云，天嘉六年（565 年）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从这个诏书可知，侯景之乱三吴难民足迹遍及福建。隋初，北方不少失意的贵族，也入迁泉州。如陈后主叔宝的三个儿子及其宗族，就是流入泉州一带。《永春县志·流寓传》记载：“镜台翁，相传为陈后主叔宝之子，隋既平陈，镜台挈两弟及宗族引兵南奔，据（永春）桃林场之肥湖，一名毗湖，今称蓬壶。后隋帝有旨令释兵为民，仍令有司四时祭其祖，遂居肥湖之瑞峰。南安曾井曾氏以长女妻镜台，面以次女、三女妻其两弟。镜台生三子，曰鸣、曰珙，分处德化、仙游；四缘，居肥湖。”而镜台之弟易任，为民后隐居永春陈岩之峭峰，死后“屡著灵异”被当地人奉为神明，宋帝受封“威应侯，又四显应（侯），支裔犹存。”另一位弟弟陈易简，“入闽为民后，居慕全里之溪西。”这些后裔都成为永春的大姓。唐武后时期，为加强对闽中南部的控制，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军队及其随军家属征蛮并在闽南驻扎下来，其所率戍闽的部将官佐有 58 姓。据《颍川开漳族谱》云，陈政先是统率府兵 5600 名入闽，后又以兵少请援。朝廷命陈政的两个长兄陈敏、陈敷领兵南下。估计入闽的这两支军队有万人左右，他们最终在漳州落籍定居下来，陈政、陈元光父子被尊为开漳始祖。这批南来的北方汉人及其后裔，也有不少后来迁徙到泉州一带居住。泉州不少著名的姓氏，就是在唐代入迁的，如施姓，“唐之中叶，始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有秘书郎承公者，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嗣是而子孙繁衍，支分派别。”① 黄

① 杨绪贤：《台湾地区姓氏堂号考》。

姓，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居两处，黄岸居莆田，黄崖则迁徙泉州。至唐代后期，随着中原地区的再度动荡，黄巢农民起义的爆发，则有更多的中原士民直接进入泉州。如泉州蔡氏，据民国《崇政同人系谱·氏族篇》云：蔡氏“本周姬姓之后，文王之子叔度封于蔡，……唐末避黄巢之乱，迁于泉州”。如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入泉，侨居晋江十七、八都间石龟，后支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曾姓，“唐僖宗光启间(885——888年)王潮由光州固始入闽，中原士民避难者皆徙以从，曾姓亦随迁于漳、泉、福、兴之间。”苏姓，“世居光州固始，唐末有苏益者，避黄巢之乱，……随王潮入闽。……自是苏姓分布漳、泉。”廖姓，“唐昭宗时，官国子祭酒，朱全忠篡唐，避乱入泉，隐于小溪场(安溪)，后嗣蕃衍，居闽南者甚众。”高姓，“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其入闽始祖钢，避黄巢之乱，挈眷由淮南西路光州固始入闽，占籍于漳州华安县，……其后遂迁安平，子孙蕃衍，瓜分散处，或居晋江永宁，或迁南安埕边。”孙姓，“先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末五季之乱，南迁入闽，居泉州东门。”张姓，始祖“张天觉，平王仙芝乱，封南剑刺史，至朱温篡唐，弃官走避闽南，居泉南槩山贤坂里(今南安县前坂村)。”^①又如泉州的另一大姓傅氏。据泉州《武荣傅氏族谱纪要》云，傅姓是得姓始祖，传到傅实是第六十九世，乃开泉始祖。公元880年奉敕率军入闽，被唐僖宗钦命为威武军节度招讨使，并赐唐太宗御像一帧以示荣宠。不久，又敕赐银印青绶，衔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傅实入闽后，建第宅于泉州仁凤门外皇山南麓，东海之滨。王潮、王审知带兵入闽进入泉州后，傅实带领全家及队伍退居南安周井堡。鉴于傅实手中掌握着相当的武装，王氏不敢贸然进攻。王审邽任泉州刺史，专门上奏朝廷请傅实协同治理军政事宜。结果，傅实被赐予爵位，食邑千户。傅实有8个儿子，分居晋

① 杨绪贤：《台湾地区姓氏堂号考》。

江、南安、泉州等地，蕃衍生息，聚族而居，成为泉州的巨家大族之一。

唐末五代乱离和王潮、王审知率兵据闽，形成了中原士民迁居泉州又一个高潮。唐朝末年，河南光州固始县的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乘唐末大乱，率兵5000人自光、寿两州南下，浩浩荡荡，转战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福建，于唐光启元年(885年)从汀州进入闽南，受到泉州百姓的欢迎，次年八月，王氏取得泉州，随后占领福州，闽中各地纷纷降服。唐昭宗李晔只得于文德元年(888年)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随后又任命他为福建观察使，尽有闽中五州之地。王潮死后，其弟审知继位。公元907年唐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封为闽王。审知死后其子延钧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王潮离开泉州后，其弟王审邽于乾宁元年(894年)继任泉州刺史，历12年。天佑元年(905年)，子王延彬再继，在任26年。王氏兄弟带领大批中原士民入泉，且兄弟父子相继主政泉州前后达40多年，对泉州地区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族文化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王氏治泉几十年间，为了维持统治，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一是招怀离散，均赋缮兵，稳定社会秩序；二是鼓励耕垦，兴修水利，采用中原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大型水利如泉州陂塘、晋江六里陂、南安自家陂等的修筑，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起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发展商业，创建泉州子城，促进对外交通；四是建立学校，作四门学，培养人才。因此，这期间泉州的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旧五代史》说：“王氏起自陇亩，以至富贵，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通鉴》说：“初审知承制加泉州刺史延彬，领平卢度使，延彬治泉州七年，吏民安之”。《泉州府志》云：“王延彬审邽之子，……袭其父封于泉，官泉州刺史，在泉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徐夔《贺清源太守》诗曰：“蕊珠宫里谪神仙，八载温陵万户闲”。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当时泉州繁荣安定的概貌。同时，王氏注重搜罗人才，礼贤下士，发展文化。王审邽父子创办招贤院等，招揽中州公卿名士，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开闽王氏家谱》云：“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他在泉州建筑了云台、凤凰、凉峰三大别馆，又大兴寺院，如建招福、招庆二大寺院，置租田四十万余石，当时王家兼并的东西很多，都称为王田、王宅、王林、王塘”。由于唐末动乱，五代纷争，群雄角逐，战火蔓延中原，而泉州独能偏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加之王氏的热情延揽，礼遇有加，使僻远的泉州成了落难士子和文人的最好避难所。中原士族纷纷涌入泉州，一时人才济济，为八闽之冠。《十国春秋·闽》“审邽条”载：中原士人陆续入泉，“审邽遣延彬作招贤院礼之，赈赋以财。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屋，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复侯叔，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宏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侔，集贤殿校理归传懿及郑璘、郑戩等，皆赖以免祸”。上述这些人物，以及这期间入泉的其他晚唐五代公卿名士，入泉动因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入泉继续为官，如黄滔、翁承瓚等；有的并无依附之意，只是为了避乱，如韩偓、杨赞图等；有的则混迹于僧，放浪山水，如杜袭礼等。但是，这些人大都有著述传世，反映晚唐的诗风和社会现实，以及泉州和闽国的概况，这不能不对当时相对比较落后的泉州文化的发展起着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王氏据泉，对泉州家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崇尚和重视家族血缘关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随王氏兄弟入泉的一大批光州固始老乡，占据泉州后，不仅聚族而居，而且纷纷成了泉州的统治者。他们之间的互相拔用，使统治者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还夹带着家族血缘的优越感。在此情势下，泉州居民对于家族的标榜和依赖，愈益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不仅与王氏兄弟入泉有关的家庭，大肆夸耀门庭，以进一步提高家族的声誉，巩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获取更